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94

CAMBRIDGE

启蒙与绝望： 一部社会理论史

[英] 杰弗里·霍松 著

潘建雷 王旭辉 向 辉 译

ENLIGHTENMENT
& DESPAIR:
A HISTORY OF
SOCIAL THEORY



上海三联书店

启蒙与绝望： 一部社会理论史

[英] 杰弗里·霍松 著

潘建雷 王旭辉 向 辉 译

ENLIGHTENMENT
& DESPAIR:
A HISTORY OF
SOCIAL THEO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与绝望：一部社会理论史/[英]杰弗里·霍松著；潘建雷，王旭辉，向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1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6131-9

I. ①启… II. ①杰…②潘…③王…④向… III. ①社会学—研究—西方国家—近现代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0203 号

启蒙与绝望：一部社会理论史(第二版)

著 者 / [英]杰弗里·霍松

译 者 / 潘建雷 王旭辉 向 辉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夏艺堂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0.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131-9/C·567

定 价 / 6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主 编 陈 恒 黄 韬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王 旭	王晋新	王晓德
王海利	王晴佳	卢汉超	刘 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 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 强
李剑鸣	杨巨平	杨熙楠	汪民安
范景中	陈 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 淳	林子淳	林在勇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俞金尧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高 毅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 洋	彭 刚	彭小瑜	韩东育
魏楚雄			

This is a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lightenment & Despair: A History of Soci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ISBN 978-0521-337212)
by Geoffrey Hawthor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1976

Second edition 1987.

This Chinese edition f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in 2018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s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亦列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行政学院学术文库系列丛书”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

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启蒙与绝望

这是一部社会理论的批判史,涵盖了从18世纪直至当前的英、法、德、美等国的社会理论。杰弗里·霍松从学科和思想脉络的“史前史”入手,特别是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思想,讨论了社会理论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假设。一般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社会学的传统“缔造者”时,往往对这些特征与假设的来源语焉不详,事实上是忽视了它们的存在。本书的特色在于,霍松根据主要理论家的意图及其身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来解释社会理论的知性历史。欧美思想之间,乃至英、法、德三国的思想之间在风格、个性方面都有悠久而显著的差异,霍松对此特别敏锐。

这部著作既服务于社会理论,也对历史做出了贡献。霍松认为,从许多明显重要的方面看,社会学史是部失败史,且其中某些角度显示这种失败已然命中注定。在本书再版的新结论中,霍松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理论,不论它曾被筹划得多么无懈可击,都会囿于理论与经验而难以继续自圆其说。

作者是剑桥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高级讲师(Reader)^①。

^① 在剑桥大学,Reader是低于教授的学术职称。——译注

序

ix

在本书中,我力图重新揭示一些人的意图,正是他们提出了当前我们视为社会理论的东西。我希望能以这些意图的本来面目来理解它们。当然,我失败了。原因之一,就如本纳德·威廉姆斯^①在他讨论笛卡尔一书的开篇所言,即便一个人能够用古乐器弹奏古乐曲,他也不能用古人的耳朵来听。我们无法理解他人的观点,因为他人的表达方式总是或此或彼,或多或少与我们有所不同。转译无法避免这一问题。奎因^②曾明言,转译是不确切的;只有通过假定他人与我们自己拥有某些共同的兴趣,具有某种心理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相似性,并通过人们所说的推己及人,我们才有可能减少翻译的不确切性。我们可以理解他人,并且只有通过假设他人本身就在某方面或某些方面与我们类似,才能理解他人。据说奎因在与其他人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们曾一致认为,别人的观点“越荒唐或者越异类”,我们转译他人的观点的“资格”越值得怀疑。当然,轻易同意奎因的这一看法可能有些仓促。但是,如果我们过于轻易地尝试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倡导的“视域共融”(confusion of horizon),这也有碍于理解他人的观点。唯有提出观点的人才能以其本来的视角来理解它。我们自己的视角只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只能预设是以他人本来的视角,而非我们自己的视

① 本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 1929-2003),英国哲学家,著有《道德运气》等著作。——译注

② 奎因(Willard Quine, 1908-2000),美国哲学家,著有《从逻辑的观点看》等。——译注

角，来理解他人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尊重观点的提出者。对一种思想或一个论断，我们不能期待或者不能立即期待“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相反，我们能期待的是“对持有该思想或论点的人以及知道它的人来说，它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不过，若说我们对“尊重”兴致盎然，那既是言重了，也是言轻了。如果尊重意味着崇敬，那是言重了。即使我们在古乐器上弹奏古音乐，我们也不必崇拜它，
x 也就是喜欢而已。如果尊重意味着我们能够避免曲解，那是言轻了；我们的个人兴趣与事后聪明导致了对他人观点的曲解。其中一些曲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局限于剩下的观点，并从中选择。可其他人未必如此。我们理解一个前人的论点的动机和意图，有时甚至只理解论点本身，是从理解论点的动机不是什么开始的，是从它没说什么、当时可能说什么，以及为了驳斥已有的观点，现在应该怎么说开始的。我们试图发现作者与当时的听众可能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显然，在发现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忘却这个论点。我们可以转而试着从作者本人当时感觉与思考这个论点的方式来理解他的感受与思想；并以作者可能认可的方式来描述它。我已经说过，这是不可能的，但即便有可能，也很难产生差异与距离所带来的启发。

我想找到这种距离。我想让自己摆脱一种强制的亲密关系，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同情赫尔岑(Herzen)时，曾亲切地称之为社会理论的“均衡幻觉”。我也想避免约翰·巴里(John Bayley)所谓的“英式恶习”与苏维埃式恶习，前者为了国家的信誉而修改已往，后者则把已往打磨成“政策与广告的一件工具”。“让已往变得陌生”，这是巴里对批评家斯科罗夫斯基(Shklovsky)的评论，我也试图能更清楚地视已往为已往，一种对我有影响的已往，身处其间的我是一个偶尔恼怒、经常困惑，并总是不安的陌生人。按照理查德·罗蒂^①最近关

^①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ty, 1931 - 2007)，美国哲学家，当代实用主义的代表，著有《哲学与自然之镜》《偶然、反讽与团结》等。——译注

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我意识到自己曾经试图避免罗蒂所谓的“观点堆砌”(doxography),即“企图把一个问题强加给一项与之无关的总原则,或者相反,把一项总原则强加给一个与之无关的问题”。有一种社会理论史认为,社会理论是没有争议、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是我要努力避免的。相反,我试图对社会理论进行历史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这必然是一种理性的重构,而且我想使之成为罗蒂意义上的“知性史”;据说在二战之前,牛津大学曾经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问题,“为什么法国的音乐会是这样的?”同样,我也试图回答,在那些社会之中并为它们撰写的社会理论,为什么会是这样。xi
可即便只是为了提出这一问题,我也必须预先判定某种社会理论是什么。我必须决定总原则。一些人认为,理论其实就是某种自然而然的東西,可以视之為一種沒有問題的、莊嚴肅穆的東西,在我構思本書的這一時期更是如此,為了避免滑向這一觀點,我必須決定提出哪些問題以及如何提問,對我來說,這就是總原則。用羅蒂的話說,我必須成為一個精神歷史學家(*Gesteshistoriker*)。

正如罗蒂所言,精神的历史(*Geistesgeschichte*)“是一种蕴含是非道德的知性史”,“从中提炼的是非道德决定了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十年前,我意识到当时的提问思路有些问题。但我就是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现在,我清楚些了。我更加清楚,如果说社会理论曾是一项事业(project)^①的话,那它到底是什么。我更清楚地知道,社会理论的筹划为什么出了问题。而且我也相信,社会理论作为一项筹划已经完成了。因此,我撰写了一篇新的论述,我希望它能更清晰地阐明总原则,也能成为一只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迟飞的猫头鹰,作为本书更透彻的导言。

此外,我还修改了第十章的末尾,改正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和模糊之处,在参考书目里增加了新近的著作。一位美国的评论家称我是“地方狭隘主义”,但我对此坚持不懈,无怨无悔。这本

① project 也可译为“工程”,现代性的本质维度之一即为“以思想之筹划(project)创造新世界”,本书按当前阅读习惯译为“事业”。——译注

书源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不列颠，而不是同时代的纽约，也不是其他时代的其他地方，更不是源自一种“普世的视角（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亨利·西季威克^①曾热情地向往这种普适观点，他从事写作的地方离我写书的地方不到几百码。的确很遗憾，我没能深入讨论美国思想的多样性。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有一本书比较了欧洲与美国的思想，那就是我的作品（即，德·托克维尔式的）。不过，如果我重写这本书，我会涉及意大利的一些思想。19 世纪末期，自由主义者热情地复兴了意大利古老的怀疑传统及其悠久的人文主义历史，这有力地解释了一个事实，即，尽管共同关注的问题促进了意大利与北方国家^②社会思想的发展，包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意大利社会思想的调子却截然不同。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特征也不同于北方。如果要研究这些差别，我认为，关于英、法、德三国的社会思想的一些讨论就可能需要精炼。

二十年前，我曾在彼得·汤森德创办的著名的埃斯科大学（Essex）社会学系授课，这本书一开始是授课的讲义。我非常感谢埃斯科大学的学生，以及到剑桥之后的学生。我十分感谢在哈佛大学有幸与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进行了交流，他对我的问题视角表示赞同，当然他的同意非我之功。罗斯·霍松和约翰·杜恩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给了我巨大的支持；本书刚刚脱稿之时，很多朋友都不辞辛劳地进行了评论；耶米里·米诺特对本书第一版的完稿呕心沥血，并鼓励出第二版；今天，我关于理论是什么、人世是什么以及其他很多事情的理解，全都归功于本纳德·威廉姆斯（这在第二版里十分明显）；在加拉加斯（Caracas）^③与刘易斯·卡斯丘的谈话，以及在写作第二版之前与理查·德罗蒂、阿兰·李

① 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 1838-1900），英国哲学家，著有《伦理学方法》等，本书第八章有相关论述。——译注

② 指英、法、德。——译注

③ 委内瑞拉首都。——译注

恩、罗伯特·盎格的谈话，都在本书中留下了印记；我在剑桥与朱迪思·斯卡拉有长达一年的交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德芬·柯林尼、约翰·杜恩、安东尼·帕格登在社会政治思想的历史与观点方面给了我相当多的启发；后三位同仁和耶米里·米诺特还阅读了我所作的修正并提出了意见。

于剑桥
1986年3月

导 言

1

撰写社会理论史的社会学家,在动笔之时就想收笔。为了写一部社会理论史,他首先必须确定社会理论是什么。如果这位社会学家给出了一个社会学的答案,那他既预设了他要解释的事物的有效性,同时他关于必须决定何谓社会理论的主张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如果他给出了其他的答案,他似乎奇怪地让自己及其学科回避了确定性问题,但他又要考察其他学科的确定性。这位社会学家在循环论证、自我否定和不良信念之间苦苦挣扎。这是一部贯穿不良信念的历史。这部历史承认,社会学家已经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它怀疑,社会学家们迄今尚未给出圆满的答案。而且,就“社会理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言,问题和答案之间的距离最远。现有的全部答案都不能回答社会理论是什么,尽管正因其不能,反倒令答案更清晰了。

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是最早的一组答案之一,也一直是最直截了当的一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是,一切社会理论都是意识形态,当然他们自己不在其列,超越知性的阶级利益是这些虚假观念的根源,它提出、秉持、维护这些信念。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有两个明显的困境。第一,正如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一书中所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只不过是关于历史结果的一场赌博,关于被剥削者能在经济、政治与知性方面获得胜利的一场赌博,尽管被剥削者其实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排斥对象,但他们是唯一有资格完全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必然取代资产阶级的命运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观点都以这一真理为基础。今天要做这种赌博更难了。

第二，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已经纷繁多样，而且还在持续增多，即便还有马克思主义者要赌博，这一事实也要求他们，要么假定有同等多样化的资产阶级，要么承认本质的资产阶级的观念就是纷繁多样的，这样阶级更迭遇到的意识形态障碍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种退让都会大大削弱最初赌博的力量。有人可能会说，这太粗略了；阶级斗争的本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特征的本性都是复杂的、变化不定的。可这样就退让得更多了，这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事物的真实状态没什么区别。如果社会之间的差异真这么大，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就所剩无几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散乱的目的论，一组有趣的概念，一种相当粗糙的知识生产概念。

涂尔干及其追随者提供了另一组答案。大体而言，这组答案就在关于宗教信念的解释之中，尤其是在关于原始分类的解释之中。这组答案指出了一个社会与其观念之间的结构相似性。至于如何评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涂尔干本人只留下了只言片语，他的追随者更精细一些，但即便是他们也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以下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一，某种观念的结构，它的前提的分类秩序，以及源于或基于其结构与分类秩序的争论，为什么要比观念的内容更重要；第二，社会到底是什么；第三，我们如何准确解释社会结构与知识结构之间的关联；关于复杂社会的异质性，涂尔干本人的看法十分武断，他认为那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而且他还夸大了简单社会的同质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观点。按照涂尔干的研究方法，我们就应当认为，每个观念或每组观念都各有特点，若真如此，我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观念有这么大的异质性？为什么观念的联系这么凌乱？为什么社会群体是以某些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发生关联？为什么一个社会的某个面向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如果回答是，这正是涂尔干方法的优点，它从经验的混沌中厘清了分析的次序，那我们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安排秩序？涂尔干的研究方法不可能给出他所承诺的更满意的答案。众所周知，涂尔干关于同质性如何产生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一些地方(例如《原始分类》),涂尔干没有混淆知识的组织化能力与特定社会中的特定分类,这个时候(例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诉诸一种观点,认为源于特定社会关系模式的情感,能让人产生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转而再造、强化与宣扬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其他人则诉诸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列维-斯特劳采纳了更直接的康德哲学观点,认为人类的心智具有某种普遍的组织化习惯,至于最终的产物则取决于特定社会的现实紧迫性。玛丽·道格拉斯^①同样也从人对认知秩序的需要具有某种受到抑制的心理学基础着手,而且她还假定,认知秩序和严密的社会控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她的理论策略是在武断的宣称和临时的发明之间走钢丝,这不可能成为一种正确的观念理论,因而也不可能作为关于社会理论之理论的合理起点,尽管在很多方面,她的策略与列维-斯特劳采所谓的修补术(bricolage)^②一样吸引人。

严格来说,关于社会理论是什么,以及如何解释的第三组答案,根本不是社会学的,但这个答案的抱负是相同的,至少,它承诺要解决上述两组答案的困境。这个答案是由图尔明^③给出的。图尔明论点的要义是把达尔文的物种演变学说拓展到知性史当中。图尔明认为,人们任何时候都能辨识出他所说的“传播”(transmits),概念种群必然要经历充分的变异,而且总是根据适应性优胜劣汰。图尔明的论点有其吸引力。他承认,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个时点,都会存在各种不协调或不适应的观念,相反,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与涂尔干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图尔明还承认一

①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1921-2007),英国人类学家,著有《洁净与危险》等。——译注

② 列维-斯特劳采(Levi-Strauss, 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集大成者,著有《结构人类学》等。这里的“Bricolage”是指原始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认识方式,与作为工程师的现代人截然不同,他们是通过“修修补补”的方式持续弥合世界图式的裂痕,用有限的旧元素融合新事物。——译注

③ 图尔明(Stephen Toulmin, 1922-2009),当代英国哲学家,著有《回归理性》、《十七世纪的科学艺术》等。——译注

个不可辩驳的真理，即，在很大程度上，观念的变化方式取决于这些观念能让人们相信的东西。但这一组答案也有困境。其中之一来自物种变异和观念的多样性与可变性之间的类比。我们能用概率发生的模型描述物种的变异，并机械地解释之。至于观念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则不能。另一个困难在于“适应性”的拓展。在生物学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适应”狭隘地规定为繁衍成功，尽管以相同的方式规定一个观念的适应、成功或适应性本身没有什么错，但这样一个定义可能忽视动物繁殖和观念生存之间截然不同的方式。事实上，图尔明肤浅但诱人的计划在每一点上都是支离破碎的。他的理论至多也就是能为描述观念种群变化的纯粹统计学提供基础。

大体而言，马克思、涂尔干及其多数追随者，都只注意到了非科学的观念，或者说，以涂尔干主义者为例，他们只看到了西方人眼里称之为原始的原型科学(primitive proto-science)。显然，图尔明想把他的解释拓展至所有类型的观念。然而，还有两个人，一位是法国哲学家巴士拉^①，一位是美国物理史学家库恩^②，他们只讨论了科学的观念，两人似乎都没有想过他们的理论也可以拓展至社会科学(库恩谨慎地否认了他的理论可以这么做)，但其他人提出了不同看法。阿尔都塞^③窃用了巴士拉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本人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他人也或多或少剽窃库恩的观点来推崇、评判或仅仅是描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异同。巴士拉的思想框架是不妥协的理性主义(但也是非正统的)。库恩则是传统主义的框架，与库恩笔下的科学家一样，这一框架是与一个执拗世界的妥协。但作为历史，结果却惊人地相似。除非有人妄称，没

① 巴士拉(Gaston Bachelard, 1884 - 1962)，法国科学哲学家，著有《新科学精神》等。——译注

② 库恩(Thomas Kunn, 1922 - 1996)，美国科学哲学家，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等。——译注

③ 刘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 - 1990)，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著有《保卫马克思》等。——译注